

- “通过多年的努力，印度和中国已经将边境谈判制度化，不断提高边境谈判的级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决定从政治的角度来解决边界问题。我不是巫师，我无法预测中国边界问题会在什么时候得到彻底的解决。但是我却清楚得知道：中国和印度的边界谈判已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国际问题学院东亚研究所教授、印度中国问题专家斯瓦兰·辛格(Swaran Singh)

- “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繁荣取决于三个主要势力之间的关系：中国、日本和美国……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发展需要这三个国家齐心协力，能够共同努力和处理共同的事宜。”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 (Ezra F. Vogel)，
《论美国、中国、日本的三方关系》

- “最惠国待遇原则实际上就是无歧视地、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世界贸易组织根据这一主要原则促成参与各方在均都有利的广泛领域内达成一致意见。在政策和实践安排方面，世贸多边贸易体制还需要有选择地采取特定的区别性措施来有效应对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发展需要。”

世界贸易组织亚太地区协调官雷蒙·克罗门纳 (Raymond Krommenacker)，《多边和谈框架》

- “当我们谈到文化，我们指的可能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制度演变、各种习俗、宗教或者信仰体系等。信仰体系对经济体制的变化影响很大。在2008年的奥运会上中国肯定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我认为中国应该更多地向世人展现中国的现在是怎么发展过来的。”

- “经济发展是繁荣的必要条件，但不是获致和谐的充分条件。东亚国家间渐增的相互依赖关系主要取决于区域间贸易、资本、人力、技术和信息的流通，而区域间相互依赖已因多国和全球性公司策略联盟、购并以及自由贸易协议而增强。至于促进和谐，它取决于消除贫穷，创造人民之间的和谐并促进与环境的和谐关系。”

经济学家、中国台湾经济企业研究所所长于宗先，《浅谈促进东亚的繁荣与和谐》

- “我对于全球化一个基础的假想就是这个失衡的世界经济迫切需要再平衡，所有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会参与进来，包括美国、欧洲、日本乃至中国。”

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崎 (Stephen Roach)，《中国经济的转型：从制造到消费》

- “中国的崛起，在过去几年间引起了部分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焦虑。但事实上，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对东亚各国是有益的。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紧密结合的模型不仅现在而且对长远都是有益的。”

澳洲国立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宋立刚，《中国的贸易扩张及其对亚太地区的影响》

- “快乐其实也牵涉到哲学问题，它是人生哲学的最终目标。个人和社会最大的目标都应是快乐，个人追求名利等等都是为了快乐。社会也一样，只不过它要求的是社会整体的利益和快乐……在温饱阶段，有钱可能带来的快乐更多；而在小康阶段，有钱带来的快乐在边际上越来越小。因此，经济越发达，越要重视如何能更有效地增进、有意地协调人们的快乐和幸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黄有光论“快乐经济学”

- “历史具有它的特定性，但是肯定存在共通性，这就是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要判断人的美丑，若只是按照白人或者是黑人的标准，对方无疑都是丑陋至极的，但如果从彼此都是人这个根本点出发，黑白人之间应当是有一种超越种族差别的、具有更普遍意义的审美标准的。因此，只有白人和黑人都学会站在双方的立场上来看自己和对方，才会得出这样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共同的审美标准。”

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加州学派”代表人王国斌论“比较历史学”

- “依赖投靠外国势力进行改革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进步，而侵略压迫别国的国家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富强。只有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加强交流合作，谋求共同发展，才是新的历史时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正确方向。”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19世纪东亚各国对外意识的比较》

-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的优质方面，因借着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而多元发展，在历史长河中继续交融。这才是未来世界文化形成的唯一途径。也是我们东亚诸国在21世纪文化建设中应具备的文化自觉。”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历史学教授何芳川，《21世纪东亚文化建设与文化自觉》

- “在如今的科技与信息化时代的背后所隐藏着的既不是军事力量，也不仅仅是经济实力亦或政权压力，而是生命的意义、价值观、共同的追求及对未

来共同的展望所具有的雄辩力。”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教授、哲学家杜维明，《东西方的对话：定位、差异与和谐》

- “当对这个世界有着不同诠释的人彼此达成一致时，真正的真理就形成了。所以真理并非开端，它是结果；它是社会对话的产物。”

意大利哲学家、教授瓦提姆(Giannangelo Vattimo)，《东西方的对话：定位、差异与和谐》

- “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可以引起冲突，甚至可以由冲突导致战争。但是，是否必然要引起冲突，能不能化解冲突、使之不因文化的不同而导致战争，这就需要我们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找出可以使文明共存的资源，用以消解不同文明之间可以引起冲突的文化因素。”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学家汤一介，《“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 “如果我们将东西方哲学的对话放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下来看的话，似乎唯一打破僵局的方法便是对话，一个建立在一系列严格政策下的对话。它必须能够保证全体人类的和谐与繁荣，而绝对不可能出现由一个国家掌权的情况。”

伊朗哲学研究所教授、哲学家赛义德·穆罕默德·哈梅内依(Seyyed Mohammed Khamenei)，
《全球化时代下的哲学对话》

- “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到来的，既不是单一的全球闻名，也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自主、馈赠，以及多元文明的繁荣。这种新的文明生态的出现和确立，是人类进化到更高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 “我又进一步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几句话表达了我对未来的理想，同时我说除了要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我认为，如果人们真地做到‘美美与共’，也就是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 “美感有不同层次。最大量的是对生活中的一个具体事物的美感。比这高一层的是对整个人生的感受，我们称之为人生感、历史感。最高一层是对宇宙的无限整体和对美的感受，我们称之为宇宙感，也就是杨振宁说的庄严感、神圣感、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正是在这个层次上，美感与宗教感有共同点。”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教授、美学家叶朗，《中古传统美学和现在美学的启示》

- “现在正出现了一个历史的机遇，需要建立一个我们的后代能够安全生存、享受更好生活水准的世界……每当我展望未来，我总是忍不住地成为一名冲动的乐观主义者……让我们将历史上的不愉快抛弃掉，让我们为一个以人权和机遇为标志的共同的未来而努力。”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在北京论坛(2005)开幕式上的致辞

- “我们必须意识到手中的机遇，建设一个让我们子孙后代活得更安全、更舒适的世界。每当展望未来时候，我纯然就是一名乐观主义者。”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在北京论坛(2005)开幕式上的致辞

- “北京论坛的主题与联合国的任务是统一的，我们都坚信：对话能够克服争端，多样共存是普遍真理，事实上，由于我们共同的命运，世界人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在分享同一个星球，如果不能在全人类中建立真正的和谐，我们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Kofi A. Annan）在北京论坛(2004)期间发来的贺电

- “1930-1950 年间，有三位北京大学的校长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对于我们两校有如此密切的联系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是一个关乎于教育、教育的发展和国与国之间彼此交互的论坛。”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9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北京论坛(2004)开幕式致辞

- “通讯与交通的发展使得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这也已成为大家的热门话题。北京大学举办这样一个国际学术交流论坛来研究这些课题，是非常及时也非常有意义的。这对推动亚太地区的社会发展，将起到尤为积极的作用。”

泰国公主诗琳通(H.R.H. Maha Chakri Sirindhorn)在北京论坛(2004)开幕式上的致辞

-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各国的和谐相处，通过国际合作，有效应对各种新的问题和挑战，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目标，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

临的新课题……不同文明间首先要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这就完全涉及到我们今天论坛的主题……‘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亮点。千百年来，它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所继承并发扬光大。”

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北京论坛(2004)开幕式上的主旨发言

- “欣闻北京论坛(2005)隆重开幕，心情十分激动……我历来主张，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和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明之间，应该取长补短、互相融合、和谐发展、共同繁荣。”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学大师季羨林在北京论坛(2005)开幕之际发来的贺辞

- “百家争鸣，不仅使北京大学的传统，也构成了北京论坛得以展开的基础。”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在北京论坛(2005)开幕式上的致辞

- “人类迈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尤其感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因特网连接世界，商品和资本在流动，文化在交锋。全球化的进程充满了获得与失去，建构与解构，失望与希望，机遇与挑战的悖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在北京论坛(2005)开幕式上的致辞

- “北京论坛的举办不仅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也是首都文化教育界的一大盛事。我相信北京论坛的召开对于促进北京市的对外开放和建设国际化大都

市，推动首都教育、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都会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朱善璐在北京论坛(2004)开幕式上的致辞

- “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理想、愿望和共同追求的目标……我坚信：这样的一次盛会，将极大地促进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增进我们的友谊，使我们能更加团结，朝着共同的目标不断前进……学术乃民族和人类的良心，21世纪人类文明的建设，各国学者责无旁贷……每个分论坛都有在其领域内极具意义的独特的论题”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在北京论坛(2005)开幕式上的致辞

- “每一个真正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应当把社会的利益作为它的最终利益，为人类的共同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正如‘北京论坛’的主题所标明的：文明的和谐、融合和共同发展。”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金在烈在北京论坛(2005)开幕之际的评论

- “北京论坛是一个以学术文化为中心的世界级论坛……北京论坛的主题，表现了我们所希望的全世界不同渊源，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的各国人民能共同拥有和谐而繁荣的未来……”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在北京论坛(2004)开幕之际的评论

- “在教育面向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北京论坛’的召开无疑是具有首创意义的事情……该论坛毫无疑问会为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和学者提供一个

互相研讨乃至更加深入合作的机会。”

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在北京论坛(2004)开幕式上的致辞

- “北京论坛的主题‘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是极具意义的。它不仅是奥运精神的反映，也是构筑人类美好未来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的反映。”

韩国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在北京论坛(2005)开幕式上的致辞

- “北京‘人文奥运’的核心，就是要用人类数千年来所创造和积累的人文精神去指导奥林匹克运动，赋予奥林匹克运动以浓厚的人文色彩，并且大力弘扬公正、平等、和谐、进取的人文精神，进而促进全人类的和平、友谊、发展和进步。这实质上就是闻名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这与北京论坛的主题不谋而合。”

北京市副市长范伯元在北京论坛(2005)开幕式上的致辞

- “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国际和平环境，需要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中，达到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和反战的目的。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面向世界发展的潮流中，本届‘北京论坛’的召开无疑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事。”

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北京论坛(2005)开幕式上的致辞

- “一个全球化的文明社会是人类的良心，是社会的创新者也是社会发展的监督人。北京论坛正是北京大学为此而不懈努力的见证；国内和海外的学者云集在此积极参与着学术对话并且为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进步献计献策。”

联合国副秘书长约瑟·夫里德（Joseph Verner Reed）在北京论坛(2005)开幕式上的致辞

- “从长远来看，在科技日益发达的将来，作为人类文化和精神的重要支柱，

人文学科的地位是不可替代和忽视的。而且在我眼中未来也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和科技的……大学在我们共同期望构建的‘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这便是北京论坛的总主题。”

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亨特·罗林斯 (Hunter Rawlings) 在北京论坛(2005)开幕式上的致辞

- “胡适所熟悉的二十世纪的初期和正在形成着的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中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在这两个时期中，中国都在追求着社会的现代化，并且对经济增长的渴望也极大地促成了与西方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亨特·罗林斯,《现代研究性大学: 知识型的创新者和文化桥梁》

- “我们目睹到的是一场盛会，因为有如此之多的不同的人坐在了一起---这是文化多元化的标记。”

智利圣托马斯大学校长杰哈多·罗查 (Gerardo Rocha) 在北京论坛(2005)大学校长联谊会上的评论

- “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投资及追求应该是一个大学的核心。”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校长迈克尔·奥斯本 (Michael Osborne) 在北京论坛(2005)大学校长联谊会上的评论

- “传统意义上的流行病学家素来是这样提问：‘为什么一些人的身体是健康的而另外一些不健康？’而社会流行病学家关注的则是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些社会形态是健康的而另一些不健康？’这两者不仅仅差在字面意义上，因为导致个人健康或疾病情况有所差别的原因在概念上与导致全体福利的原因不尽相同。”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何内一郎 (Ichiro Kawachi)、美国坦普尔大学法学院教授斯科特·布里斯 (Scott Burris),《整合法律与流行病学》

- “现今的大学,在建设和谐社会以及推动建立一个在世界上拥有众多伙伴的全球化的学习型社区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施春风(Shih Choon Fong)在北京论坛(2005)大学校长联谊会上的评论